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平唐

合订本 第十四卷

希望过了8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浪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6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40—42辑

总第
40—42
辑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十四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003

◎ 唐生明

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057

◎ 陈长捷

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阴谋的回忆/064

◎ 岳星明

李仙洲率部入鲁反共纪实/079

◎ 赖惕安

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094

◎ 高树勋

蒋军在豫皖边区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108

◎ 张庆第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111

◎ 饶少伟

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124

◎ 巢威 黄梦年

湘桂黔大溃退目睹记/130

◎ 曹福谦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135

◎ 康 泽

我所经历的蒋特三个集中营的内幕/143

◎ 黄彤光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黑幕/156

◎ 邹高竞

1944年天河口民变纪实/163

◎ 金汉鼎

1945年宜宾大刀会进攻县城的前因后果/166

◎ 刘学超

我在中国银行的一些回忆/175

◎ 冯耿光

忆语随笔/187

◎ 曾毓隽

复辟之役马厂誓师亲历记/196

◎ 陈文运

我参加讨伐张勋复辟之回忆/208

◎ 叶恭绰

我在复辟之役中的亲身经历/213

◎ 苏锡麟

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222

◎ 费泽普

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227

◎ 韩世儒

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断/235

◎ 杨文恺

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241

◎ 汤芑铭

1921年直军援鄂的经过/245

◎ 张方严

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252

◎ 宁 武

二次直奉战时阎锡山与直奉皖军阀的钩心斗角/257

◎ 周 玳

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270

◎ 谢宗陶

吴佩孚败退天津琐记/281

◎ 潘承祿

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284

◎ 李炳之

1926年吴佩孚的重返洛阳/295

◎ 王维城

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298

◎ 黄应乾 陈祖武 刘克俊

张宗昌兴败纪略/317

◎ 王翰鸣

段祺瑞公馆见闻/334

◎ 王楚卿

附 注

对《吴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51辑

对《段祺瑞公馆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51辑

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361

◎ 杜聿明

蒋军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400

◎ 廖耀湘

蒋军第二十五师在宽甸、桓仁地区被歼经过/415

◎ 段培德

我参加蒋军四平街战役的回忆/420

◎ 张广居

蒋军四平街解围战役中的八棵树争夺战/425

◎ 郑庭笈

塔山战役的回忆/435

◎ 林伟俦

锦州蒋军被歼回忆/446

◎ 卢浚泉

长春解放经过/453

◎ 龙国钧

沈阳解放的一些回忆/463

◎ 赵国屏

蒋军第五十二军营口漏网记/471

◎ 廖传枢

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475

◎ 张潜华

我所知道的张群/489

◎ 冯若飞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的经过/496

◎ 邵 青

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500

◎ 刘瑶章

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503

◎ 屈凌汉

北平“七五”事件真相/508

◎ 王化一

冯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519

◎ 高兴亚

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526

◎ 范绍增

40年买办生活回忆/528

◎ 严逸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 唐生明

一 前 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面被迫参加抗战，一面随时准备卖国投敌，长期暗中勾结敌伪，进行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我当时是由他亲自派往南京，充当他这“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特把我亲身参加的蒋、汪、日联合反共活动的种种内幕和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写了出来。不过事隔多年，记忆不全，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尚望了解当时情况者给以指正和补充，俾使蒋、汪为了坚决反共反人民，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假手敌人来屠杀同胞的滔天罪行，能更全面地揭露出来。这便是我写述此文的目的。

我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务去南京后，又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他也希望我替他建立一支军队，来实现他所标榜的“反共建国”的“国策”。很显然，汪逆利用我这个黄埔学生的招牌和我大哥唐生智的关系，作为他宣传号召的资本。同时，当日寇发觉了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以后，他们也如获至宝一样把我抢了过去，看成是日蒋重新亲善的桥梁。

尽管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我没有完全做到他们三方面所寄托于我的“希望”，而且对他们三方面在反共问题上的目标一致，而又有彼此间的利害冲突的种种情况，虽不完全了解，但几年间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还是不少。

有人可能不完全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我去执行他的这一项最秘密的任务？这里，我不能不把我的情况简单说明几句。

过去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我一贯讲究生活享受的关系，使我养成了一种吃喝玩乐的“人生观”；要说我从前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的话，也不过是希望更大地满足我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欲望罢了。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蒋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他们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讳。

过去我对别人反蒋，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内心深处则认为反蒋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蒋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说没有什么根基。直到现在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使我重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辈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过去我结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许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20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终不愿参加军统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罪恶的特权来满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我是被过去朋友们认为所谓“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减去不少麻烦，别人最讨厌特务向蒋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我和戴笠是无话不谈，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蒋介石选择我去担任那样一项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蒋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蒋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蒋活动。当蒋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贺。

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许多人都熟识，所以蒋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以下便是我所要叙述的这一段经过。至于我与戴笠在其他方面的许多问题和我几年间在沦陷区与许多大汉奸往来时所了解到其他方面的材料，我还将陆续写出来，这里只着重先写奉蒋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问题。

二 蒋介石给我的一个“重要特殊任务”

抗日战争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任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酆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

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一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绍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约在1940年春间，有一天，沈醉忽然送给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议。……”我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正当我准备辞职的时候，很凑巧地接到了“常桃警备司令部撤销、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我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下文。

我很快地将警备部结束，即去长沙见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结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告诉我说：“委员长有命令要调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一点去。”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我刚到家没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问我回家后的情况，并问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说明尚须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没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蒋介石也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回重庆，说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们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我们到桂林时，杨继荣在车站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已准备好第二天的班机机票。可是蒋介石更性急，他指派了一架专机迎接我大哥和白崇禧，我们便一同去重庆。由于专机起飞时间提前，戴笠没有来得及到机场迎接我，我和张素贞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我大哥家中。戴接到我们的电话，立刻赶到范庄，把我和张接到他曾家岩住宅。

戴笠这次与我见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兴。我急于要了解这次蒋介石叫我到重庆究竟要我做什么工作，戴却故意和我大兜圈子，不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反而先问我在这种时候我应当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我因自己事前没有准备，以为只是听从蒋介石的安排，经他这一问，反而一下回答不出来。我正在考虑时，他却又趁机为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既要使我生活过得很好，适合我的个性，又要能够一鸣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说老实话，我是个公子哥儿，除了希望安排一个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能使我吃好玩好之外，我是从来没有去考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经他这么一说，倒使我感到有点诧异起来。我一向性急，便不客气追问



他，叫他不要再和我要花样，他当时仍没有正面答复我的问题，又把话题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

经过了两天这样磨磨蹭蹭，他才慢慢地把话拉到主题上来。我们谈这些话时，大都是在夜间，因为白天他很忙，常有客人来打扰，只有夜晚比较清静。这时除我和他之外，张素贞经常在旁边听，但很少插嘴。戴的另一个情妇余素恒（湖南人，现仍在美国）有时也参加听一听。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蒋介石给我安排的工作，实在是我所猜想不到的。戴笠用极其慎重的口吻对我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像这样伟大的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当时他给我戴上这顶高帽子，确实使我感到飘飘然。

我骤然一下不知如何答复他的话，心里正在考虑；他又接下去说：“校长说你很能干。他在谈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说过，过去在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虽然你以后在广西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但校长知道那是因为受了何键的压迫，你才去广西的。校长对那件事始终是原谅你，而且也很了解你，对你一直是很重视。”

他一提起过去多年的旧事，使我更不知要怎样回答。他看我不作声，马上又接着说：“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要立即召见你，因为要我先把许多事和你讲清楚，并和你研究好以后再去见他。”

我一听到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后，真是感到又惊又喜，当时的心情的确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老实说，这一点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胆怯，害怕出问题，甚至可能送掉性命。我倒不担心汉奸会杀害我，因我同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有些交情；可是日本人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到那时叫天不应，谁也不能保我的险。因此我对这样一个任务不敢马上承担下来，一直在慎重考虑，犹豫不决，拖了三四天，我都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我平日遇到重大问题自己不能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找我大哥商量，请他给我出主意。这次戴笠却不让我先去和我大哥商量，天天找我谈这件事，好像非要说服我答应不可。他为了要破除我的顾虑，曾仔细给我介绍了当时上海方面许多情况。他一再重复地说：“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设想过，你去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地

去，大大方方地与他们往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问题。”最后，他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说他决不会存心把我送入火坑。话已经说到这样程度，我不能不作出答复了。

约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才向他表示原则上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有一个条件，我只愿意站在朋友立场给他去工作，绝对不愿作他的部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所领导的军统是一个很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是很残暴的；我害怕他趁此机会给我套上军统组织这个圈套，以后就得受到组织的约束，那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了。我很诚恳地向他表示这一意见，并着重说明我不愿作他部下的原因：因为那对我对他都没有好处；主要是我当了他的部下之后，他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和他讲真心话；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他一听到我原则上已同意去，立刻显得非常高兴，对我所提出的意见，完全都可以接受。他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避免出危险。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顾他们。”

我对他这一些话表示同意之后，他立刻当着我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9点钟召见我。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

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你了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



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这次见面便谈到这里。我辞出后，由侍卫长王世和陪我一同到办公室主任商震的房内，戴笠紧接着就进去和蒋谈了好一会儿才出来邀我一同回去。在车上，戴又给我戴高帽子，他非常兴奋地说：“校长能这样对你，真是不容易呵！”

大约是和蒋介石见面后的第三天，他便约我和戴笠一同去他的官邸吃晚饭。这次吃饭只有蒋介石夫妇和我们两个人，饭前饭后都谈了不少问题。他问了我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的关系，他很注意听我回答他我过去和这些人的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表示出对我的关怀，叫我去以后，一定要随时与戴笠取得联络，好让他随时了解我的情况。同时，他还用很含蓄的口吻对我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所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作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第一次见面他说要送给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已由他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蒋中正、蒋宋美龄”和年月日等之后，这次当场交给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抗战时是存放在我母亲身边；胜利后我一直是悬挂在我的客厅中。许多朋友看到，都不明白这幅照片的来历，为什么蒋夫妇要送照片给我母亲，过去我也不便说出这一段经过。

吃完饭以后，蒋介石当面送给了我一万元特别费，当时约值黄金20两左右。

临到走的时候，蒋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我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随时知道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戴笠传达他对我的指示。

最后，他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听他的口吻和说话时的神情，好像